

ME

# 西方世界的兴起

THE RISE OF THE  
WESTERN WORLD

【美】道格拉斯·诺思 罗伯斯·托马斯 著  
厉以宁 蔡磊 译

华夏出版社

★ 现代西方思想文库 ★

作出的贡献的真正检验,不在于他的名声,而在于他的思想所具有的力量,要看它是否能鼓舞他人,是否能促进新的研究,是否能使经济史学科充满生机以及它本身是否有能力长期存在下去。”<sup>①</sup>

---

<sup>①</sup> 转引自萨奇和沃尔顿:《新经济史探讨》,一九八二年版。

.....  
modern thinking **LIBRARY** **ML**  
现代西方思想文库

---

## 现代西方思想文库 总序

社会的发展,科学的昌明,思想的进步,永远需要某种有着丰富养料的环境。这种环境在所有有理智而又不乏灵气的人们心中,首先便是丰富的思想材料的累积。近代中国,自十九世纪中期以降,许多学者为此倾力于西方典籍的传译,成绩斐然,功不可没。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西方学者研究现代社会诸多问题的新作迭出,这些新作对于当今中国广大读者,显然具有重大的启示和借鉴意义。因此,翻译出版现代西方思想名著,尚有许多工作可做。

如同读者所知,现代西方思想不仅源流学派异彩纷呈,而且显示出深层转变而日益走向综合发展的趋势;同时,这一令人捉摸难定的趋势,又隐约显示出深远的历史渊源、文化背景以及学理的传承相继。“现代西方思想文库”的创设,恰好立意在接续先贤传译西方思想经典的伟业,为我们的思想界、学术界理解和借鉴现代西方思想的精华,提供基本的养料或食粮,以期看到我们思想界、学术界在荆棘与鲜花并

见的求索的道路上更进一步。

“现代西方思想文库”选译的著作，在力求反映现代西方思想学术的独创性与思维深邃性的同时，尤其注重思想的全面性及其内涵的启迪价值。现代西方的思想佳作，无论是哲学社会科学还是广义人文科学，无论是既已成为主流学派的名家大作，还是依然在支流思潮中涌动强劲的新秀新作，无论是以思想观念的独创性而特立独行于人类思想史的“义理之学”，还是将研究方法的更新变换纳入漫漫思想长河的“考据之学”，凡此种种无不在搜罗之列。我们的译介，尤其倡导严谨求实的学风，以研究探索性翻译为译事所追求的目标；“勿以译为讹为托言”，应当成为我们以及我们的译者们的座右铭。

“现代西方思想文库”既是一项恢宏繁复的工作，也是一份至为艰巨且任重道远的事业。在这项工作进行的过程中，在此项事业发展的旅途上，我们首先应当由衷地感谢那些关注这一文库的读者们。同样，我们也要感谢那些为我们提供了养料或食粮的思想家们以及把这些材料传译过来的人们。最后，我们还要感谢那些在我们的期盼中将会扶助并参与到此项事业中的人们。

谨此为序。

“现代西方思想文库”编辑委员会

一九九八年十二月

## 经济增长与制度因素

厉以平 蔡 磊

《西方世界的兴起》一书于一九三七年在美国出版,作者道格拉斯·诺思和罗伯特·托马斯是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和经济史学家。一九七〇年和一九七一年,他们合作在《经济史评论》上发表了《西方世界成长的经济理论》和《庄园制度的兴衰:一个理论模式》等论文。他们在文章中提出一个重要论点,即经济增长的关键在于制度因素,一种提供适当的个人刺激的有效的制度是促使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而在制度因素之中,财产关系的作用最为突出,无论是封建庄园制度的兴起和衰落,还是近代产业革命的发生,都与私人财产地位的变革有

直接的关系。所有权不确定,私人经营的产业及其收入没有合法保障,或者说,如果没有制度的保证和提供个人经营的刺激,近代工业就发展不起来。《西方世界的兴起》就是他们在这些论述的基础上合作写成的。

作为新经济史学的代表作之一,《西方世界的兴起》体现了“经济理论与经济史的统一”。一九六五年诺思在题为《经济史状况》一文中指出,传统经济史学的主要缺陷在于未能利用现有的理论,而如果不利用现代经济理论,则不仅无法解释诸如“一国经济的兴衰”这类重大的问题,甚而连具体的经济史过程也说明不了。新经济史学的另一位代表人物福格尔也指出,经济史与经济理论的再统一,要求在经济史学的基本经研究中“把经济理论当作一个综合的工具来使用”。诺思和托马斯在本书中对西方近代民族国家兴起这一课题进行探讨时采取了不同于过去的论述方法,而运用了交易成本理论、公共产品理论以及所有权理论,从而被认为实现了“经济史与经济理论的统一。”

《西方世界的兴起》之所以引起重视,还在于作者在本书中所得出的结论本身的意义,就是试图改变从某一偶然的技术革新中寻找发生产业革命的原因的偏见,而引导人们从现代所有权体系和社会制度漫长的孕育过程中去寻找经济增长的原因。这样对经济增长的历史动因的解释便从生产技术上转移到了人上。历史上的财产关系的演变,私有财产关系的出现,便自然归结为是经济人合理选择的结果,即与不同资源稀缺程度、供求关系和相对价格变动相关条件下合理选择的结果。

诺思和托马斯的论述引起了西方经济学界很大的兴趣。《兴起》一书出版后,在新经济史学研究领域不断有追随者和仿效者出现,不断有新著作问世,运用类似的方法研究制度变革的原因和过程,提出种种重新解释西方各国历史的观点。正如诺思所说:“对一个学者所

# 目 录

序 言 .....	(1)
<b>第一编 理论和概论</b>	
第一章 问题 .....	(5)
第二章 概论.....	(14)
<b>第二编 公元九〇〇年至一五〇〇年</b>	
第三章 土地和人的所有权.....	(29)
第四章 中世纪初期结束时的经济形势.....	(36)
第五章 中世纪盛世:边疆运动 .....	(46)
第六章 十三世纪的欧洲.....	(61)
第七章 十四世纪和十五世纪.....	(91)
<b>第三编 公元一五〇〇年至一七〇〇年</b>	
第八章 财政 政策和所有权 .....	(117)
第九章 近代初期 .....	(129)
第十章 法国和西班牙——竞争失败的国家 .....	(150)
第十一章 荷兰和成功的经济增长 .....	(165)
第十二章 英国 .....	(181)
结束语 .....	(193)



## 序 言

在某些方面,本书试图成为一本革命性的著作,而在另一些方面,本书又确实是非常合乎传统的。本书的革命性在于我们发展了一种复杂的分析框架用来考察和解释西方世界的兴起;这个框架与标准的新古典派经济理论保持一致并互为补充。由于本书的撰写是为了使那些没有受过经济学训练的人能够看懂(并希望他们感兴趣),因而我们避免运用专业术语,试图尽可能做到明白晓畅,直截了当。

本书又是合乎传统的,因为我们是以许多前辈的开拓性研究作为依据,这个领域的学者们会欣然看到我们从马克·布洛切、卡洛·西波拉、莫里斯·多布、约翰·H·内夫、M.M. 波斯坦、约瑟夫·熊彼特以及波洛克、梅特兰和斯塔布斯等古典派法律制度研究中受益匪浅。

我们应当强调这是一项解释性研究,一份扩展了的解释性梗概,而不是传统意义的经济史。它提供的既不是标准经济史的详尽无遗的研究,也不是新经济史的准确的经验性的验证。本书的目标在于为欧洲经济史研究提出新的途径,而不是迎合以上哪一种标准形式。它不过是新研究的一项议程。

我们特别要感谢以下诸位:特别是我们的长期患病的同事史蒂文·彻温,他在发展理论框架方面给予了帮助;马丁·沃尔夫把他关于法国财政史的即将成书的手稿借给了我们;戴维·赫利海和 M.M. 波斯坦通读了全书并对本书第二编最初手稿提供了详细的建议和批评意见;特里·安德森和克莱德·里德不仅对我们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帮助,而且撰写了有益的批评性评论。最后要感谢各大学的许多读者,他们听取了理论问题部分的初稿。虽然本书无论有什么价值都应由

各方面共同分享,不过本书的缺点最终则由我们负责。

国家科学基金会为这项研究提供了财政资助,才使本书得以完成。基金会对我们的研究一直颇为关怀并给予支持,对此,我们谨致以谢忱。

特别要感谢马里恩·伊姆波拉,她设法将我们费解晦涩的文体改为具有可读性的形式;此外还要感谢乔安内·奥尔森在这方面所作的努力。

我们感到如果在书后为每一章的资料来源备有一份总目录<sup>①</sup>,并将引文和解释性插话专门放在脚注里,也许可以改进本书的连贯性和可读性,不过这可能要冒犯某些学者了。

---

① 中译本未予保留。——译者。

# 第一编 理论和概论



## 第一章 问题

西方人的富裕是一种新的和独有的现象。在过去几个世纪,西方人已经冲破了赤贫和饥饿困扰的社会束缚,实现了只有相对丰裕才可能达到的生活质量。本书旨在为西方世界的兴起这一独有的历史成就的原因作出解释。

本书的中心论点是一目了然的,那就是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一个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在西欧的发展正是西方兴起的原因所在。

有效率的组织需要在制度上作出安排和确立所有权以便造成一种刺激,将个人的经济努力变成私人收益率接近社会收益率<sup>①</sup>的活动。在后几章我们将提出并运用一种有关的模型,而后描述引起制度

---

① 私人收益率是经济单位从事一种活动所得的净收入款。社会收益率是社会从这一活动所得的总净收益(正的或负的)。它等于私人收益率加这一活动使社会其它每个人的净收益。

变革的参数转换。但是首先我们必须以简化的形式指出达到经济增长的基本条件和考察私人和社会的成本收益的差别。

说到经济增长,我们提出**人均收入**的长期增长。真正的经济增长意味着社会总收入必然比人口增长得更快。另一方面,停滞状态则导致**人均收入**的非持续的增长,虽然平均收入在时间相当长的周期中可能有升有降。

如果社会上个人没有刺激去从事能引起经济增长的那些活动,便会导致停滞状态。就算社会上个人可能忽略这类实际刺激而进行选择,就算全社会有一些人满意他们现有的地位;然而,偶然经验主义提出大多数人仍宁愿选择较多的物品而不选择较少的物品,并依这一原则行事。经济增长只需要一部分人对它怀有渴求。

我们反过来解释如果一个社会没有经济增长,那是因为没有为经济创新提供刺激。让我们考察一下它的含义。首先我们必须把生产要素(土地、劳动、资本)投入增加引起的收入增长类型分开。这种直接的增长导致全面的(外延性的)增长,但不一定是**每人收入**的增长。有两种情况可以加速后一种**人均收入**的增加,我们把这称作经济增长。一方面,人均生产要素的实际数量可能增长。另一方面,一种或几种生产要素的效率的增长也可能引起经济增长。这种生产率的增长可以通过规模经济的实现出现,因为生产要素质量改进了(劳动力受到良好的教育,资本体现新技术),不确定性和信息成本造成的市场缺陷减少了,或者由于组织的变革使市场的不完善得以消除。

以往,大多数经济史学家宣称技术变革是西方经济成长的主要原因;诚然欧洲经济的历史是围绕着工业革命而展开的。稍后有一些人强调对人力资本的投资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原因。近来,有些学者已经开始探讨市场信息成本下降对经济增长的效应。毫无疑问,以上每一种因素都对产量增长有明显作用。所以规模经济建立在市场越大,生

产就越大的基础之上。由于上述原因,还由于我们整个关心的是按人口计算的经济增长,所以人口扩张本身也是我们确定经济的“实际”增长需要把握的一个尺度。

前一段反映的这些情况几乎普遍被经济史学家和经济学家在他们对过去经济成就的判断中当作决定经济增长的因素来看待。然而解释显然存在漏洞。使我们疑惑不解的是:如果经济增长所需要就是投资和创新,为什么有些社会具备了这种条件却没有如意的结局呢?

我们认为,答案使我们回到最初的论点上去。我们列出的原因(创新、规模经济、教育、资本积累等)并不是经济增长的原因;它们乃是增长。而本书着眼于引起经济增长的那些原因。除非现行的经济组织是有效率的,否则经济增长不会简单地发生。个人必然受刺激的驱使去从事合乎社会需要的活动。应当设计某种机制使社会收益率和私人收益率近乎相等。私人的收益或成本就是参与任何经济交易的个人的利得或亏损。社会成本收益为影响整个社会的成本收益。私人和社会的收益或成本之间的不一致是指某个第三方不经他们同意会获得某些收益或付出某些成本。每当所有权未予确定限制或没有付诸实施时便会出现这种不一致。如果私人成本超过了私人收益,个人通常不会愿意去从事活动,虽然对社会来说可能有利。本书提到的一些历史上的争论说明每一种情况都与所有权有关。

试举海洋运输和国际贸易为例。航运者不能确定他们的实际位置是海洋运输和国际贸易发展的主要障碍。这需要有两个座标即纬度和经度的知识。确定纬度的能力较早便具备了,只要测量北极星的顶垂线即可;但在南纬度上北极星隐没在地平线以下。为了寻求替代的方法葡萄牙的亨利亲王召集了一批数学家,他们发现测定太阳在中天的垂线(当它与太阳斜面重合时)可以产生所需要的关于纬度的知识。不过,测定经度就比较困难了,因为需要一台在远洋期间保持精

确度的计时钟。西班牙的菲利普二世为发明这种计时钟悬赏一千金克朗。荷兰把赏金提到十万弗罗林,而英国最后悬出的赏金依天文钟的精确度定为一万至二万镑不等。这笔奖金一直悬赏到十八世纪,最后由约翰·哈里森获得,他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耗尽了半生精力。精确测定轮船位置给社会带来的收益,按减少了轮船的损失和降低了贸易成本来衡量是巨大的。突破究竟发生得多早,在于有没有所有权来保证发明者收入因节省了轮船和时间而增加。(当然他也要承担研究的高成本和发现一项成果的不确定性。)付给数学家报酬和提供奖金是刺激努力出成果的人为办法,而一项专为包括新思想、发明和创新在内的知识所有权而制定的法律则可以提供更为经常的刺激。没有这种所有权,便没有人会为社会利益而拿私人财产冒险。

说到实施所有权的方法,也可以举海洋运输的例子加以说明。在几个世纪里,海盗和私人武装是令人憎厌的,而且只有它们普遍从贸易中得到好处。海盗的威胁提高了贸易成本,并缩小了贸易的范围。一个解决的办法是行贿,英国采取那种露骨的办法防止了北非海盗多年在地中海的劫掠。行贿是“有效的”,因为在地中海自由贸易的收入增益总的说来足以超过为使国家境况改善而付出的贿赂,而且这种办法有时比海上保护所费便宜。

另一些国家这时采用护航的办法来保护运输,有的还部署了海上巡逻队。海盗的最终消失则是舰队在国际上实施所有权的結果。

至于制定得不完善的所有权,我们的第三个例子取自近代初期西班牙的土地政策。随着人口的增长,土地日渐匮乏,增进农业效率的社会收益率提高了,但私人收益并没有提高,因为国王早已授予羊主团以其惯用的方式在西班牙放牧他们羊群的专有权。小心准备和种植谷物的地主可能已料到迁移的羊群随时会吃掉或践踏坏他的庄稼。在这种情况下形式上的所有者并不享有对其土地的专有权。



这些实例可能会给好奇的读者带来许多疑问而不是作出解答。为什么社会不早些发明对知识财产的所有权？为什么听任海盗发展？西班牙国王为什么不废除羊主团的特权？为什么不允许无条件继承地(fee-simple<sup>①</sup>)享有完全的土地所有权？

在头一个例子中出现了两个可能的答案。要么想不出办法让船主把他从海上安全度提高中所得到的收益付给发明者(一种“技术上”的限制),要么便是其时收集信息的成本超过了一项潜在发明预期带来的收益。因为每个人都不想为贿赂作出贡献,而只希望从别人的贡献中受益。

这时我们发现了两个普遍的原因,解释了历史上所有权为什么不曾演进到使个人收益与社会收益相等的地步。(1)可能缺乏技术阻止“白搭车”或强迫第三方承担他对交易成本的份额。例如,使单个陆路商人免遭隐蔽在俯瞰商路的城堡里的领主劫掠所花的费用,最初使行贿或交纳通行税比试图防止它们发生要便宜,但是火药和火炮的出现最后使这种堡垒变得易受攻击,从而降低了实施这些所有权的费用。这对今天也是合适的。技术问题使发展和实施在思想、发明和创新方面的所有权以及在像水和空气等某些自然资源上的所有权出现类似的困难,因而要付出很高的代价。为了使个人收益接近社会收益,保密、报酬、奖金、版权和专利法在不同的时代被发明出来;但使局外人不得受益的技术直到今天仍一直是代价很高和不完善的。(2)对任何团体和个人来说,创造和实施所有权的费用可能超过收益。以上列举的都是很恰当的例子。海盗和武装私掠者造成的亏损可能比护航的成本或海军进攻的成本要少。类似的是,在废除羊主团的特权、建立

---

① fee-simple 即不限定继承人的继承身分的土地。只有当承租人绝嗣没有继承人时,土地才交回领主。——译者